

## ◆最終討論◆

## 現代中国学は何を目指し、何を実現するか

●**司会（山本一巳）**— ただいまから最終討論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時間が限られていますので、分科会ごとに質疑応答を進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非常に短いのですが、一分科会 10 分間で、次のセッションに移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最初に方法論から入ります。質問、コメントのある方は簡単をお願いします。

どなたかございますか。はい、もう一度挙手をお願いします。

●**鄒驥**— 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那么关于方法学第一天我曾问过加加美老师，加加美老师当时给我个回答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对象它是一个能动的，我的最后的认识就是应该是一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今天又听金观涛老师谈到、依然谈这个议题，那么我就想我们现在在做的一项工作，我想做这样的一种结合，在今后的工作中来贯彻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现在在做环境研究的时候谈到人们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背景是做经济学的，那么就想把这种环境意识和人们的偏好建立起联系来，就是从意识到偏好（awareness to preference），把这个偏好（preference）再和市场上的需求（demand）建立起联系来，然后我们试图用一种实证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调查的方法，我们去一个一个的访问，去做大的样本，做 2000 多户、做 1000 多户，在不同的城市，做这种意愿定价调查（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试图在建立这样的联系，但是我现在还不敢确认这样的一种工作能不能和加加美老师、金观涛老师讲的这种对研究对象的互动，或者说研究对象它是一个能动的，他们自己会说话，会有思想，不知道能不能建立这样一种联系，如果要是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比较自觉的和这样的方法论去结合的话，那么我想可能会形成一种补充。谢谢！

●**司会**—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金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金観涛**— 其实这个问题我再简单讲几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讲这个互动，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对象它的想法、它的观念，不要管它外在的层面。那么我想因为对环境问题我不懂，我们做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把一个东西当为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没有观念的一个客体这样的存在。那么我想你们环境、我们每一个对环境的调查，他的人的对环境的行为实际上后面都是有观念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不看这个观念，是看他的一些行为，那么我想如果你们发展一些数据，能够把他们的价值偏好能够调查出来那肯定是增加了你们研究的客观性。

●**司会**—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他にどなたか。

●**時殷弘**— 我也间歇地参与了现代中国学部过去好几年的研究和活动，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它们肯定不全面。首先一个印象当然就是现代中国则整个项目非常庞大，也坚持了好几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就。无论在总体方面，还是它的各个分组的一些重要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坦率地说我有两个不一定很准确的感觉，觉得已有的工作还有些缺憾。第一，我觉得这个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等层面的方法，总是有个重要问题，即怎么来整合，how to integrate those diverse aspects。我想加加美先生以及特别是方法组的研究者们是想用一种新的 methodology，甚至将此作为一种范式转换来整合全部研究，这大概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然而，

我认为如果要整合现代中国研究，就不能局限在 methodology 方面，我们还是要有层次上更高的东西。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总的研究以及各个分组研究可能有一种偏向，就是侧重于（甚至在我看来有点过度地侧重于）looking down upon earth，研究中国社会很多具体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要认识和阐述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发生的这么大的变迁和更改，looking up 也非常重要，甚至一定意义上更重要。我们要研究 political leadership，或者说 leadership at the top level，研究从毛泽东、特别是从邓小平到今天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世界观，他们关于中国和中国所处世界环境的看法怎么变化，他们目前怎么想怎么做，还有他们根本的治国方略，也可以说是他们的 grand strategy。这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仅是 looking down upon society，恐怕是很不够的。天天看十三亿人，而这里面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太分散，而且有的也太被动。我们与此同时还是要有 looking up 的视野，观察和研究中国当代的 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研究 power exercised at the top。当然，不是光看他们的权势和权势运作问题，还要看（甚至一定意义上更多地看）他们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及其演化，看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战略及其演化。这至关重要。还有，我认为可能由于我们非常多地注重方法，同时又非常多地注重 looking down upon the whole society，因而特别偏重哲理性的方法讨论和细节的微观考察，而对它们可能确实有一些需要予以填补的缺失和需要优化的重要方面。另外我认为，如果这么大一个已经进行了四年的项目今后还能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而言的尽可能较系统的政策提议，即在 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 national policy, and national strategy 的意义上的 policy suggestions，而不只是哲理的和关于很多具体问题的一些方法上的讨论或学术建议。如果这样，那么可能对这个项目今后的前景将更有帮助。一句话，要多一些 policy-oriented 的色彩。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ので、加々美さんから2、3分で答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加々美— 最初の問題で、環境調査に関して、その研究調査対象者と調査者の間に意思をめぐる相互関係があるという問題について、少しだけ先に申します。

例えば、日本の国内で社会調査を実施する場合には、この調査は何の目的でおこなうのか、また調査結果を何に利用するのかという調査の目的と結果の利用について、事前に調査対象者に説明するという方法をとっています。

ところが、今までの中国やインド、東南アジア、など途上諸国に対する地域研究と称する社会調査では、そういう手続きをすべて省いてきました。本来調査対象者は、何のために自分が調査されるのか、また調査結果が何に用いられ、どのように自分たちの社会に反映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知る権利があります。これが本来の社会科学の根本的ルールです。本来はそう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れを私は「アカウントビリティ (accountability: 説明責任)」と言っていますが、この点を確実に私は履行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れから、時さんの出された問題で、簡単に言いますと、上から下へ、例えば、政治指導者がどのような世界観を持ち、どのような政策観を持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がかつて決定的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ました。短期的には依然として、その問題は重要です。

しかし、大きな時間軸で見たときに中国社会の変化、それはまた空間的にも時間的にも大きな変化を起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この点は劉新さんの指摘したとおりです。時間軸で見れば明らかに短期的には、特定の指導者の世界観や外交政策観、あるいは国内の内政観、内政に関する政策観によっては、中国社会を動かすことが出来るように見えます。しかし中長期的には動か

し続け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内政外交にわたって、この点をきちんと踏まえ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その意味で「民意」を強調して申し上げました。民意が形成されてくるプロセスが、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に萌芽的に現れていて、それが今後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こと、時間軸、空間軸においてとらえること、これが実際に有効かつ重要な手段になるだろうと。私のコメントはこれだけです。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政治のセッションの質疑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なたか質問、コメントを、意見表明ある方、挙手を願います。

●**質問者**— 昨日からこの会議に参加しましたので、各分科会報告を聞いていませんが、先ほど各代表の報告でだいたいの内容がわかりました。そのなかで一言、少し気になる表現がありました。私の記憶が確かであれば、政治分科会の報告だったと思います。「中国外交の特徴は内政の延長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表現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私は外交とか政治を特別に研究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ぬので、一般的に内政の延長上にならないような外交は想像できないとか、そのような外交をとっているような国家があると思えないのですが、例えば、もしあるとすればどのような例があるのか、例えば、日本の国政で、外交であればどうなのか。あるいは程度の問題を言ったのであれば、中国外交の内政の延長上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ほかの世界の各国の外交と比べて中国外交の特徴とする点について簡単に説明をお願い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

●**司会**—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小島先生お願いできますか。

●**小島**— これは二重の意味を込めて使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1つ目は、中国外交は内政の延長であると、これは中国自身が中国外交を説明するときに繰り返して言っています。中国の外交部長、あるいは中国のリーダー達が一貫してそう主張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2つ目は、そことつながってきますが、まさにそのような意識を中国の指導者達、中国側は外交戦略、外交政策を展開する際に、その点を意識しておこ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の2点です。

一般に外交は内政の延長であるというのは、どこかに辞められた首相がいますが、そのようなかたちで、どこでもそうでしょうけれども、特に2点目のところから引っ張り出されてくるのは、中国の場合には、中国の内政、中国の国内の情勢、そのようなものが中国の外交政策を決定する際、展開する際にかなり意識されながらなされ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申し上げ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もう一度まとめて言えば、中国自身が外交を内政の延長だということを意識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そして、実際の中国の外交の転換を見ると、やはり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も中国の内政が非常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という点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他にどなたか。

●**質問者**— 我是中国大陆来的，薪英辉，西安交通大学的，我的问题是向南开大学的朱老师提一个问题，请他回答一下，那就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阶级阶层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化我们在划分它的阶级阶层的时候，它的标准究竟跟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相同，它的变化在哪里，不管怎么变，它划分起来应该是整个的社会成员没有剩余。第二个，我们在划分社会这个阶级阶层的时候应该把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能够概括出来，这样有助于实际问题地解决，比如说现在中国最初的、最突出的，以我个人看有三大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个划分里头很难体现，第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富裕起来的这一批人，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第二个，特殊的一些带垄断性质的行业也形成了第二大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

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媒体上不太报道，实际上大家都承认，那就是在公务员系统特别是党内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很特殊的特殊利益集团，最近的一次报考公务员，只招收一小部分人，而报考者则几倍十几倍，有的职位甚至上百倍于，那么要招生的、要招收的人数，这显然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这三大问题我们如果说在划分的时候能够给以恰当的说明，那将会是我们这一届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贡献，我的问题完了。

●**朱光磊**— 谢谢晋老师。关于您提的问题我讲四句话，第一，研究社会利益群体有许多角度，我选择的角度是标准的阶级阶层的角度，还可以有其它的角度，比如我们通常有时候说中等收入群体，有的时候又说垄断群体，有的时候说这个群体、那个群体，那个都是多种多样的角度，我选择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阶级和阶层，比如说高收入阶层那个阶层跟我所讲的阶层不完全是一个含义，我有时候也这么讲，您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讲，我当然也很关注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肯定有许多其他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第二个，研究问题一般来说，特别是象我做比较宏观的问题的，我是要对框架比较注意，对大的东西比较注意。边界的事情总是不清楚的，做任何事情都有时候不得不划一个边界，但是边界的两边差别是很小的，可是，你必须得划，就象考试 60 分及格，你说我 59 分和 61 分差不多，我们经常要是讨论这个问题，我这个研究工作就不能进行下去了。第三，我个人对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我抓的最大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突出变化，跟踪这种研究，象我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已经出过两版了，最近马上要出第三版，我主要是抓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我昨天的那个主体，没时间不说了。最后第一句话就是说，报公务员人很多，我觉得这个大体上，这是一个正常情况，在许多国家公务员也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职位；再有就是说上百人、上百倍、几十倍，我觉得这里边它是有许多重复计算，比如说有的中学校长说好的中学——所谓重点中学的校长说今年有一百个博士报我了，实际上据我所知，一个去的也没有，因为人找工作的时候都要投很多，有的时候要投几十份、上百份，这里头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谢谢！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次に経済のセッション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ご意見、質問のある方。

●**康荣平**—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康荣平。我是经济组的成员，我想今天就这个机会超出经济组的范围从多个方面来谈一谈我对建立现代中国学的一点看法。那么我很欣赏加美先生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而来建立这个新的中国学，我希望能不能考虑一些下面的其他的几个视角。第一，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这些发达国家，它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的人口大部分都不到一亿，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一亿人口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是一个，现在十三亿人口，我们可以简称为“十亿人口的现代化”，那么十亿人口的现代化能不能拷贝一亿人口的现代化？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因素比如说石油，大家知道美国这些年来也就是两亿多现在刚刚三亿人口它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石油，那么如果十亿人口的中国要拷贝这个模式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十亿人口的现代化如果能解决得好的话，那么可能对全人类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因素，我觉得是从人口密度的角度，跟第一个因素是相关的，就是说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可以说它是一种低密度人口的现代化，那么中国跟他们人口密度不是一个档次，其实整个亚洲都差不多，这种差异带来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西方理论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第三个因素，我觉得是从宗教冲突、对立程度的角度，这个也是中国跟欧洲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我觉得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整个对人类、对世界和平也好、对什么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不展开了，现在“9·11”以来的变化大家看得都非常清楚。那么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由于宗教带来的战争几乎没有，这个对于

未来有什么影响，对现代有什么影响，我觉得都是有别于西方的那些的该研究的东西。最后我想谈一个视角是文字，也许象形文字是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在使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拼音文字。实际上这两种文字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从历史的长河上来看汉字对中国的统一和维持这种统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欧洲，起码我认为它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它分化出越来越多的小的国家。这种文字对于经济、文化以至经济技术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有别于西方的那种研究或者是对于建立一个更有特色的中国学，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谢谢！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他にどなたか。簡単をお願いします。

●柳欣— 我是南开大学的柳欣，也是经济组的，昨天、就是这几天的讨论给我一个印象，今天上午的发言也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因为现在研究中国学的一个最大的背景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我在我们组讨论的时候我就表述了一种观点，刚才康先生也说了，实际上说了我的意思，中国的崛起可能要比人们预期的要快得多得多，比如说中国的出口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增加，很可能投资是不是也会达到这么一个增长的速度？我想可能也会，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近期的事情，昨天我在讨论的时候说了一个词，叫帝国主义，可能会引起疑义，象殖民、侵略，我说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帝国主义，我要讲的，想研究中国走出去，它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竞争，形成一个有中国来参加的世界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竞争。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和日本，可能我的感觉是更接近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崛起可能已经是确定的了，那么它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竞争，很可能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可能是和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相比，很可能更接近一些。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能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或者是基础来研究中国学，而不要是把中国作为一种威胁、中国作为一个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谁是霸主？中国和日本？我总感觉到有这么一种感觉在里边，我觉得一个竞争、今后的一个竞争实际上会形成一种很鲜明的文化的这么一种竞争，好，谢谢！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まり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ので先に進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あと時間があれば壇上の方に1分くらいずつ発言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続きまして文化セッションに移りたいと思います。何かご意見、コメントは。

●周長城— 我是武汉大学的周长城。刚才谈到文化问题和经济实际上是有关联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仅仅从经济的层面来看中国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就是中国的现在人的现代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好象经济的很多的指标在国际上都很高，但是真正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十三亿人的这种人的现代化和这种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可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另外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现代中国学将来的研究，就是第一次开会我就说过了，我们比较注重方法的和环境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想将来如果再能做的的话，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该关注在转型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现在是在居于一个转型的，但对于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了经济的转型，但是我们对社会的转型却又往往忽略掉了，所以很多中国现在当代的中国的问题都是因为转型过程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比方阶层的分化以及三农问题，人的现代化问题，等等都是因为转型，这个转型太快，这个急剧的转型，这个转型它有什么特征，中国会向何处去，这种转型它的伴随物、经济的现代化的伴随物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想我们用将来的这个现代中国学的研究可能要把转型、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机制要引进来，在这个背景下面来考量我们这个转型的这种或者叫转型社会学或者转型社会的研究，可能将来更应该注意，谢谢！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馮昭奎— 我问的是那个经济的问题，因为我跟柳欣先生正好是相反的意见，我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不是现实，中国的预期要比人们预期的要慢得多得多，是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的崛起。

●賈保華— 我也来说一点文化。我上次也说了一下，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些基本的文化概念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比如说关于中国，大家都在说中国、中国，实际上我觉得包括日本人对中国这个字的理解都有误解，当然中国人也有误解，怎么误解呢？就是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含义就是位于世界正中或中央的国家。这种理解恐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中国要成为世界中心、或者领导或霸权的联想。实际上不是的，中国的这种近代的地缘政治学的含义在历史上是比较新近才出现的，我没有仔细地核对——恐怕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年的历史。过去中国的含义是“中土”或“中原”，就是中间的土地、中央的平原、即现在的华北平原，它主要是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而不是近代的所谓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中的那种概念。所以，人云亦云地说什么中国这个名词本身就具有中国是世界中心、或要成为世界中心的流行说法是不妥的。还有一个容易误解的词就是“帝国”，中国人过去从来不叫自己是帝国，秦始皇汉武帝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秦帝国”“汉帝国”或“大秦帝国”“大汉帝国”。但是，这些年有些中国人却把古代中国称之为帝国，而且好象两千两百年前中国就是个帝国了，这就是盲目地用西方的一些文化或者政治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另一个例子，这恐怕也是要造成误解的。总之，如果我们要象金观涛老师和加加美老师提出的那样，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学的话，恐怕我们要把迄今为止的、这些似乎正确无误的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否则我们用旧的、西方的概念来研究现在的新的中国，恐怕很难得出新的结论。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他にどなたかもう一人。

●時殷弘— 刚才周星教授讲的有些话，可能是不经意的，但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太乐观了。我最近一两年在中国写文章和做演讲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真正挑战实际上不在于积累力量方面，而在于文化和价值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要与过去曾经在近现代世界上起过巨大作用和率先性影响的英国相比，或者与最近约一百年来影响最大的美国相比，中国最大的挑战恰是在于与文化密切相联的基本价值与其创造方面。现代文化、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跨国价值观念（transnational value）可以归结为四个范畴，一个叫经济成长，一个叫自由，还有一个叫社会正义，还有一个叫生态保护。就此，我们可以盘点一下目前中国的文化。经济成长方面当代中国很了不起，经济成长成绩很大，然而经济成长这个 value 不是我们创造，是欧洲人三四百年以前或两百年以前的创造，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创造一个新的、可以称得上世界历史意义的根本价值。第二是自由，中国最大的进步或贡献就是十三亿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经济自由，这毫无疑问是世界自由史上的巨大的进步，是自由在世界上的巨大扩展，然而经济自由作为现代跨国价值观念同样不是我们的创造，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创造，何况我们在实现高速的经济成长和急剧膨胀的经济自由方面太多地牺牲或损伤了另外两个价值——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所以如果这样盘点，我觉得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现在千万不能乐观。我们最大挑战是在这广义的文化方面或社会价值观方面，那就是看我们中国能不能形成这么一个文化：它将对中国人民自己有最大的鼓舞力，使中国人民再过例如 10 年 20 年能够象 20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人民一样说“我们优越”；同时，它将使世界至少很大一部分人民说“中国的面貌、精神和生活方式很好”，值得他们由衷地赞赏甚或由衷地羡慕。所以我想，中国要成为 G D P 世界第一也许不成问题，中国要成为世界外贸总量第一也许同样不成问题，甚至中国要在军事上（那当然要经过很长时间）成为一个与美

国相比虽然相对落后但是差距不大的强国也不成问题，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宁可说在于根本价值观成就和价值观创新，亦即目前我们中国能不能在象过去荷兰人、英国人、20世纪美国人那样对世界的跨国价值体系有世界历史性的创新性贡献。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远远未有这样的成就和贡献。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環境セッションに移ります。ご意見、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一ノ瀬**— 国立環境研究所の一ノ瀬といいます。私も環境組です。最後の榎根先生の1枚のスライドで、中国情報学のセンターが必要だろうというようなお話がありました。10年くらい前に、アメリカのコロンビア大学の CIESIN: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という組織がものすごいお金をかけて、中国に3S (GIS、GPS、RS) のハードウェアを普及させていった経緯があります。

短期間で田舎の大学とか、地方の研究機関でもそれなりのハードウェアが入って研究者や技術者がいるという状況がつくられています。当初はデータの提示にとどまっていたレベルから、今ではしっかりとした応用研究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ります。本来の目的が達成され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現在では、その CIESIN の活動はややフェードアウトしてよく実態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きました。資金的な問題もあるのだと思います。その背景も踏まえて、ご提案の内容を少ししっかりしたものに検討され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ました。

それから愛知大学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わが国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のセンター、COEとしての役割があるわけですが、ご指摘のとおり自然科学の方面が弱いということです。国立環境研究所はつくば市にあります。日本のなかでは、中国関連の自然科学方面の研究者が多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こを理工系を中心にセンター化していこうという提案を所内でもしているのですが、なかなか理解が得られません。

最後に、一般に日本人が中国に関して自然科学系の人々が研究をするときには、日本語や英語ができる中国の人との交流、対話とか、文章を読んでという、やや一方的なかたちを取っています。それによって先ほどの誤解の話も賈先生が指摘されましたが、微妙な感覚の差が積み重なって、結構大きな差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ます。最後に理工系の中国語教育のようなかたちを、これから日本も検討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以上です。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先ほど後ろのほうで手を挙げていた方、最初をお願いします。

●**劉昌明**— 我的名字叫刘昌明，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我想就这个环境问题谈几点看法。第一点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环境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应该有这样一个看法，因为我在中国到处跑、到处开会，我觉得环境是、不是说比以前好了，但是这观念甚至的影响或者一些说法的影响，可能有不同的提法，好象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还是有所改善，确实有的地方是有些改善，但总体上来说形势很严峻的，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我们过去比较，在信息方面，中国也很多不同情况，这是体制问题，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统计，比如环境部门和水利部门对这个水的污染问题有时候可以差一级，所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还是受这个统计、基本信息的影响，所以方法论上还是注意这个资料、这个信息是来自什么样的，要全面的比较。第三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看、

分析一些问题的时候，好象经济学、其它社会学都比较古老，关于环境学怎么研究，尽管人们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从科学研究从哲理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对的要后起一些，不是很先进的，我们过去用别的观点来看的话，对环境问题也应该用辩证唯物的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这个问题，是马克思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实用的。另外一个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看，大概宏观上看，比如说中国的环境项目做东北的时候，总体上说我们生态条件是在恶化，但是局部是在改善，这就是一个宏观的说法，我们对环境的估计，一些方法论问题的话有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这些观点，我认为统统都应该把它综合进去，而且应该有宏微观的一些看法，我刚才觉得榎根先生他非常博学，而且看了很多国际国内的资料，他对这个线性的划分都是很好的，但实际问题的话，第四点我讲中国的话还是在面临着快速发展经济，环境问题很重要，怎么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可能比其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里牵涉的问题不仅是环境本身，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其实环境保护关系着人，因为从历史上看，在古老的时候环境跟人这个关系，人是服从于、从属于环境的，到了现在人口多了以后，人是跟环境对立的，就发展，这样的环境是人永远需要、而且人生存的这样一个空间，环境我们可以把它解剖一下，它的环境要素、它所谓的环境要素，比如说包括阳光雨露，包括温度气候，它都是正面的，它们这个反面就是灾害问题，正面都是资源，所以我觉得对环境问题我们应该从方法论和从实际问题上两个结合，就是实际需要的跟方法论是要结合起来，我就这么一个观点。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もう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ので、各セッションの質疑応答は終了いたします。壇上の先生に1分以内でひと言ずつ発言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は榎根先生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榎根— 中国学をどのようにつくりあげるのかという話をする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私はあまり楽観的ではありません。地域を切り取って地域の学を成立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あまり楽観的ではありません。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並木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並木— 「中国」という言葉、それから「国家」という言葉、「帝国」という言葉でもいいですが、それぞれみんな歴史があったというご発言が先ほどありました。大変同感いたします。

「中華帝国」という言葉が、私たち日本人は大変好きですが、歴史上、「中華帝国」という言葉を最初に使ったのは袁世凱の中華帝国です。それ以前に中華帝国というのはなかったと考えま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を私たちはもう一度思い出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高橋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高橋— 柳欣先生から文化についてありましたので、この点を中心として1分間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日中文化に共通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のとおりだと思います。しかし、違うところも多々あります。さらに企業競争になりますと、その文化が露骨に対立したり、あるいは企業文化が日中の共通するところがあっても、企業は競争ですから優勝劣敗です。これは中国企業のなかでも競争はありますし日中間でもあります。これが企業の宿命だと思います。したがって、その共通項のところを企業の活動のなかに生かしていくことは大変難しい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もう一点ですが、私どもの研究会のなかには多才な人材がそろっています。先ほどの私の話とも関連しますが、情報をいかにして集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が大変重要です。メンバーのなかには国際経営の第一人者と言っていい川井さん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あるいは李春利さんのよう



にずっと自動車産業を研究なさってきた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います。むろん小島先生もそうです。いろいろ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が、問題は情報です。この情報をどのようにして集めるか、つまり調査をどうするのか、これが今後の課題です。以上です。

●**司会**—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小島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小島**— 現代中国学、「学」をつくるのは大変です。慶應義塾大学の総合政策学部も総合政策学先導拠点という名前でCOEを展開しています。われわれも総合政策学をつくら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われわれは、それを「10センチの学問」と名付けています。これも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難しいポイントはやはりディスプレイです。そして、その研究の対象にどのようなスタンスをとるのか、これが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

そこで私は、特に中国政治との関連で申し上げたいことは、これは慶應義塾大学の宣伝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やはり実学としての取り組みということがひとつの突破口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福沢諭吉は実学に関連して、「人間交際<sup>じんかん</sup>に益をなさんとするの志」と言っています。つまり社会に貢献する志、これが学問の出発点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中国政治の取り組みは、やはりそのようなある種の現実への働きかけの意欲と具体的な行動と、これが重要な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愛知大学と東亜同文書院がつながっています。まったく一体とは思いませんが、まさにその志が重要な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学」の説得力はやはり成果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ます。その成果は具体的な中国との関連した研究と中国との関連のなかであげられる成果だだと思います。実は、私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中国における植林活動でやっています。以上。

●**司会**— はい、次は加々美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加々美**— たくさん発言していますのでかいつまんで話します。第一点、榎根先生が地域研究を前提として、現代中国学という「学」の問題を少し批判的にお話になられました。実際に地域研究委員会という学術委員会の成果はほとんど出ていないという事例です。

私どもの現代中国学は、地域研究そのものを方法的に突破するという、ですから地域研究の延長上で何か「学」というものをたてるというのではないという点です。この点をもう一度確認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点は、戦後まもなくドン・マッケイとフェアバンクが地域研究を打ち立てたわけですが、その時点から見れば、約60年の歴史を地域研究は既に持っています。この60年の歴史を覆すのが現代中国学が目指す方法です。

それから、康榮平先生がお話になった13億の現代化、これは極めて重要です。確かに史无前例(shiwuqianlie)、つまり歴史的に前例のないものです。歴史的に前例のないというのは、実は9・11テロ事件以降の国際社会の変化も前例がないものです。

つまり、現代中国学は前例のない時代、中国の国内も国外もあらゆる空間環境が前例のない状態にあり、そのなかで歴史を踏まえて、しかも時代的な時間軸をすえて、しかもその時間軸が同時代的に空間的に100年前はどうであったのか、その国際社会がどうであり、中国の国内社会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そうした点を見つめながら未来にまで視野を広げる、今まさに歴史的な前例のない時代に入ってきています。

これは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です。その点こそが現代中国学が必要になる理由です。あまり歴史が変っていないのであれば、昔の方法でも構いません。しかし、そうではないのだという問題意識があって、このCOEが試みられているとだけ申し上げて私のコメントとします。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馬場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馬場**— 先ほどのお話をお聞きして気にな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少し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文化の概念に関連しますが、私たちは全体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漢族と少数民族とお互いにどのように見るかということ、文化人類学の先生が中心になって議論しました。

そこで、私が先ほどから気にしているのは文字としての漢字です。中国はご存じのように漢民族と 55 の少数民族で成り立っています。多民族国家である中国では、文字のない少数民族もいるわけです。それらの全体の文化をどのように統合するかという場合、政治的な概念として中華民族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その文明、文化として「中華文明」「中華文化」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が、これはあくまで私は政治的なひとつの概念づけ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それから、先ほどから出ています他の文化的要素を入れろという議論の中で、企業のなかでの行動様式とか、政治舞台における中国人としての文化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これはやはり、従来の中華文明とか中華文化という概念ではとらえき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したがって、今、まさに私どものやっているのは、そのような既成の概念でまず考えるのではなくて、率直に申し上げますと、先生方の発言を聞いても漢民族の発想かなと、外国人からみるとそのような発想を感じられます。それらを含めて私どもは議論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つまり従来の中華文化で包含できるのか。少数民族の要素、それから今までの文化という要素でとらえきれない要素を含めて新しい概念が出せれば、それは私どものひとつの方法論化と思います。どこまでできるかわかりません。試行錯誤です。でもポストボタンの時代は概念から入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どもの今の研究の方法論です。以上です。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周立群先生です。

●**周立群**— 現代中国学の研究、経済学应该做出它应有的贡献，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对一个 C A S E、一个现实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我们的真正困难在于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我认为在构建现代中国学的建设中经济学思维范式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有两个方面是我们在起步阶段应该做的。第一个方面，是要放宽我们经济学的原有的很多假定和限定，这里包括很多新的变量，包括空间、文化、传统、习俗、人口这样一些变量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作为它的变量进入我们的模型。这个方面国际上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这些变量并将其纳入了经济分析。第二个方面，是要大跨度的进行比较、追溯和预测，这里包括对历史的追溯、对现实的各个国度、各个区域的比较以及对未来的长远的预测，尤其是对于经济正处于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它本身具有不成熟性和变动性，那么在这点上更需要对历史的借鉴、对历史的追溯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今天的比较。我们在起步阶段，在这两方面如果有些推进的话对于构建中国学的研究特别在思维方式、范式的转换是会有帮助的。谢谢！

●**司会**— では、次は朱光磊先生。

●**朱光磊**— 我接着周教授刚才的话说，我的看法是基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基于中国各种问题广泛的代表性和极大的特殊性，我认为在未来的 20 年中，我们或许到了该尝试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学说的时候了，祝愿在坐的各位在这个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金観涛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金観涛**— 在这个学科日益专业化，专业越分越细并且越来越隔离的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建立新的中国学、设立它的方法论组是很有远见的，而且在面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全球化正可能对人类的环境产生毁灭性的颠覆的这个可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学建构中间设立环境组也是

很有远见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点是我们整个中国学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也是以后要坚持的东西，但是我同意时殷弘先生所讲的，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把这方面的研究扩展到更实质的层面，比如说以后的研究怎么促进不同专业的对话，不同领域的专家同时对一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以形成某些更深的见解，谢谢诸位！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少し時間をオーバーしましたが、これで終わり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ま方から出された非常に刺激的で有益な議論を踏まえて、今後とも愛知大学は現代中国学のさらなる研究に向けて進んで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今後ともご指導ご協力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本日は遅くまで熱心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